

峙峪遗址刻划符号初探

尤 玉 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现代人类使用的文字、数学以及艺术,都是从远古人类的刻划记号、符号和图象开始的,并且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知识的积累才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旧石器时代的刻划记号、符号和图象,是当时人类认识自然界和记载自身活动的可能保存下来的重要证据之一,因此,它们成为探索远古人类智力发展的极其宝贵的资料。

就目前已经掌握的文化遗物来看,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刻划记号和符号,始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克罗马农猎人,其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32,000 年。但是早期的刻划记号和符号难以识别,只能作初步解释。刻划图象易于认识,但出现的时间稍晚,欧洲马格德林时期的精美的艺术品,例如洞穴中的壁画、刻划在岩石和动物的角、牙、骨骼上的动植物图象及猎人雕像,其年代大约距今 10,000—20,000 年^[1,2]。

在我国,旧石器时代的刻划材料发现甚少,在研究上还是一项空白。最近笔者在重新整理 1963 年从峙峪遗址发掘到的一批兽骨片时,发现其中具有人工刻划痕迹的兽骨片达数百件之多。有一件骨片的表面上,留有比较复杂的痕迹。通过显微镜的反复观察,并与现有的腐蚀、印痕骨片的详细对比,证明了上述的数百件兽骨片表面的痕迹是该遗址的主人——峙峪人刻划的。

现将峙峪遗址扼要介绍如下。

峙峪遗址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根据放射性 C¹⁴ 的测定结果,年代为距今 28135±1330 年。遗址位于山西省朔县峙峪村北侧,东南距县城 15 公里,为晋西北高原与桑干河上游平原的交界处。

遗址经较大规模的发掘,获得的文化遗物计有:旧石器近两万件、烧石烧骨数十块、骨器若干件、装饰品一件以及晚期智人枕骨化石一块。峙峪文化的显著特点是:以小石片和精致的细小石器为主体。石器的加工复杂,类型繁多,小巧美观。与之伴生的脊椎动物化石经鉴定有:鸵鸟、刺猬、斑鬣狗、虎、鼯鼠、披毛犀、野马、野驴、赤鹿、河套大角鹿、普氏小羚羊、鹅喉羚、王氏水牛、诺氏驼等^[3]。根据对这一动物群的分析,草原性动物约 80%,充分表明了当时当地是以草原为主的自然环境,年平均气温比今略低。

遗址的地质剖面如图 1。

上更新统 (Q₃):

4. 灰黄色黄土,厚 18 米; 3. 灰白色砂层,厚 8.9 米; 2. 黑灰色、褐色亚砂土 (即文化层),夹两条灰烬层,厚 1.5 米; 1. 灰白色、棕褐色砂砾石层,厚约 1 米。

~~~~~ 不 整 合 ~~~~~

---

本文 1982 年 3 月 30 日收到。

下伏：二迭系砂、页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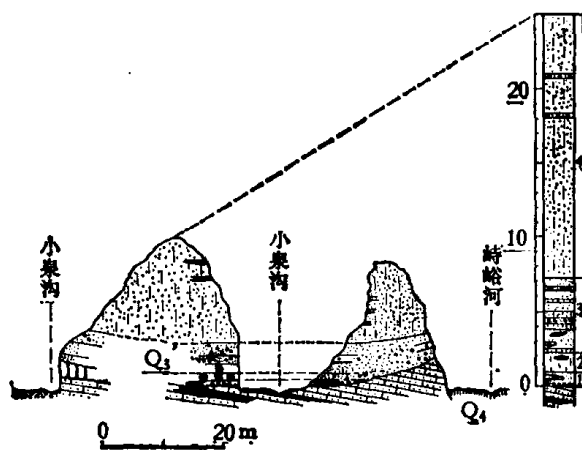


图1 山西峙峪遗址剖面图

文化层中出土的野马、野驴的牙齿超过五千枚，按牙齿排列位置进行分类统计，表明至少代表130匹野马和90头驴；普氏小羚羊角近200个，说明代表了近百只羚羊。这样大的数量在同时代遗址中是罕见的。兽骨片共达两万余件，从断面分析，都是人工砸击的结果。按兽骨片的长度，大致可分两种：即8—10厘米和15—18厘米。具有刻划痕迹的兽骨片都属于前一种。由此看来，刻划骨片是峙峪人有意识的产物无疑。

骨片的刻划痕迹有四种类型：凹坑（包括圆型凹坑和三角型凹坑）、斜纹（包括竖纹和横纹）、网纹以及图象。凹坑可能是一种符号，以表示猎取大型动物（例如披毛犀、虎等）的种类和数量。斜纹与网纹有可能表示通常捕猎的动物的数量，如野马、羚羊、鸵鸟和鼯鼠，因此这两类属于记号。有图象的刻划骨片仅一件。刻划图象往往是远古人类为了表达他们的活动和环境而制作的，它是从符号进一步发展的，原始的刻划图象实际上也是一种刻划符号。

刻有图象的骨片是用野马的肱骨制成的，长8厘米、宽3.1厘米。对于所刻的图象（或符号）可初步解释如下（图2）。

左：可能表示一只刚被击毙的普氏小羚羊正躺在草地之上；后面有从两侧追来的猎人。

右：可能表示一只疾跑的鸵鸟正遭到猎人从三个方向的包围。

从峙峪遗址获得的资料证明，峙峪人以狩猎为其主要的经济活动，捕猎的主要对象是野马、野驴、普氏小羚羊、鸵鸟和鹿类。由于野马的图象比较复杂，峙峪人用石制工具刻在骨头上还力所不能及，而羚羊的图象要简单得多。更新世晚期，我国北方广大地区，普氏小羚羊和鸵鸟曾繁盛一时，并成为当时人类重要的猎取对象。因此，峙峪人在骨片上刻划的图象，表示他们猎取这两种动物是很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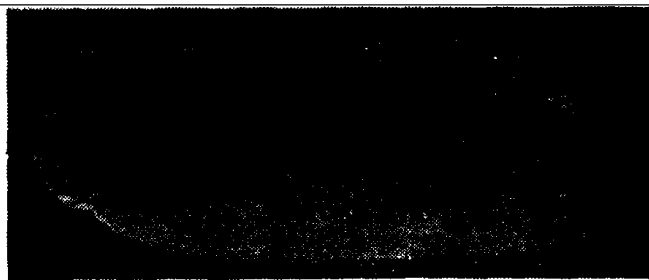


图2 峙峪遗址出土的刻划骨片 ×0.5

据上所述,我们可对几个问题加以探讨。

(1) 峙峪人已经有了最简单的数量方面的概念。在许多刻划骨片上留有数目不等的刻痕,特别是5以内的斜纹较多的重复出现不可能是偶然的现象。从刻划的“普氏小羚羊”图象看,角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或三个。显微观察发现:“普氏小羚羊”图象腹下另加三道浅痕,表示腿是四个而不是一个。周口店山顶洞遗址所发现的五个骨管(串成手镯)分别刻有1—5的凹痕,也证明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古人类已经懂得简单的数字,并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sup>[4]</sup>,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数字源于半坡。

(2) 骨片上的刻划痕迹很深。多次实验表明,我们用钢刀或石器刻划骨片,其刻划的深度仅为图象深度之半,这说明峙峪的雕刻者是有力的。显微观察还证明,他们是用石制工具刻划的,因为在凹痕的骨壁上留有许多擦痕。根据刻划的先后顺序和刻划方向判断,雕刻者是左手紧握骨片,右手持石制工具进行刻划的,这与现代人的正常习惯相一致。

(3) 刻有图象的骨片,表面十分光滑,有的浅痕已被磨损掉,这件与其他数以万计的骨片不同。据推测,它可能在主人的手中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很有可能它是峙峪原始部落首领的拥有物。

(4) 晚期智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已掌握了制作精巧的石器和使用复合工具的能力,因此生产力得到很大提高;同时,他们对某些动物的活动规律有了初步了解并采用不同的方法捕获它们。有了这些基本知识,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才会在骨头上或岩石上刻下各种记号、符号或图象。这是一种创造,虽然还不是真正的文字、数学和艺术,但在文化发展上毕竟是重要事件。因此,对峙峪遗址出土的骨片上刻划符号的研究,对于探索生活在我国大陆的祖先的智力发展和中国汉字的起源将是有意義的。

致谢: 本文承贾兰坡教授指导,谨致谢意。

### 参 考 文 献

- [1] Alexander Marshack, *Science*, 178 (1972), 24: 817—828.
- [2] Alexander Marshack, *National Geographic*, 1975, 1: 65—90.
- [3] 贾兰坡等,考古学报, 1972, 1: 39—58.
- [4] 彭曦,考古与文物, 1981, 2: 95—100.